

闻一多

诗经讲义稿笺注

闻一多◎著 吕明涛◎笺注

《闻一多诗经讲义稿》是闻一多先生晚年最重要的学术成果，也是他大量开讲《诗经》研究心得的结晶。《闻一多诗经讲义稿》是闻一多先生晚年最重要的学术成果，也是他大量开讲《诗经》研究心得的结晶。《闻一多诗经讲义稿》是闻一多先生晚年最重要的学术成果，也是他大量开讲《诗经》研究心得的结晶。



闻一多

诗经讲义稿笺注

闻一多◎著

吕明涛◎笺注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闻一多诗经讲义稿笺注 / 闻一多著; 吕明涛笺注. —北京: 当代世界出版社, 2008.8

ISBN 978-7-5090-0391-6

I. 闻… II. ①闻…②吕… III. 诗经—注释 IV. I222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31983 号

闻一多诗经讲义稿笺注

出版发行: 当代世界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(100860)

网 址: <http://www.worldpress.com.cn>

编务电话: (010)83908400

发行电话: (010)83908410(传真) (010)83908408 (010)83908409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聚源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 本: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: 8.25

字 数: 18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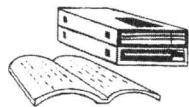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次

书 号: ISBN 978-7-5090-0391-6/I · 078

定 价: 24.00 元

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;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!



前言

时人得知闻一多先生首先缘于他轰轰烈烈的死，其次是他的《红烛》、《死水》等新诗，而占《闻一多全集》五分之四篇幅的有关古典文学研究的论著却并不为世人熟知。换句话说，作为民主斗士的闻一多，身后享尽了无限的哀荣；作为诗人的闻一多，也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；而文学史家这个足以让闻一多比肩古今学人而不稍逊的身份，却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看重。相映成趣的是章太炎先生，太炎先生尽管被鲁迅先生盖棺论定为“有学问的革命家”，并认为章氏的业绩“留在革命史上的，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”。（鲁迅《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》）但是现在看来，学者的章太炎远比革命家章太炎要知名得多，这固然与政治话语的转变有关，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政治的业绩远非学术上的业绩来得持久。因此，我们可以推断，对闻一多先生的评价不论发生怎样的变化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人们尽管哀悼民主斗士的闻一多，但人们扼腕痛惜的却是英年早逝的学者闻一多。郭沫若在为开明版的《闻

一多全集》所写的序中说：“假如在一多获得了人民意识之后，再多活得十年，让他在事业上，在学问上，更多地为人民服务，人民的收获想来也不会更微末吧？在他把文化史的批判工作的准备刚好完成，正有充分的资格来担当批判过去，创造将来的时候，却没有让他用笔来完成他的使命，而是用血来完成了，不能过分矫情的说，这不是重大损失。”字里行间所流露的惋惜之情不可谓不沉痛。

闻一多的善变，似乎已成为后人为其盖棺论定的共识，就连闻先生生前的好友、学生也不讳言。吴晗在为王康《闻一多的道路》所写的序中有这样一段回忆：“大概是一九四四年的冬天吧，在朋友家谈天，罗隆基先生笑着指一多先生说：‘一多是善变的，变得快，也变得猛，现在是第三变了，将来第四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？’一多先生也大笑说：‘变定了，我已经上了路，摸索了几十年才形成，定了的，再也不会变了！’”罗隆基总结的三变，季振淮在《闻一多年谱》中说得更为明晰了：“从早年放弃美术从事诗歌，到中年放下诗笔沉入古籍，再到晚年步出书斋走向广场，一生凡三变矣。”闻先生放弃美术从事诗歌创作大约发生在二十年代，放下诗笔沉入古籍则贯串了整个三十年代，步出书斋走向广场发生在四十年代。

闻一多先生这种在创作、学术、政治之间的漂移，在近代学人中并非独立现象。我们知道，传统治学讲求的是家学与师承，重传而不重变。近代以来，中国政治文化遭受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，这也彻底打乱了中国固有的政统、文统、学统。政治要变法，文学要革除文弊，学术也要积久思变。近代以来，以不同面目示人，最为成功者当属梁启超。梁启超不仅承认自己的善变，其师康有为也对

他有“流质善变”的评价。如果说梁启超的善变可能缘于他接受过西学的熏陶,而没有西学背景的近代儒学经师廖平也居然说出了“为学须善变,十年一大变,三年一小变”的话来,足以说明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学术内部发生的这一丕变。在这样一个大文化背景下,再来审视闻一多的角色选择,便会多一份了解的同情。

二

闻一多这三个角色,朱自清概括为“诗人”、“学者”、“斗士”,并说:“大概从民国十四年参加《北平晨报》的诗刊到十八年任教青岛大学,可以说是他的诗人时期,这以后直到三十三年参加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五四历史晚会,可以说是他的学者时期,再以后这两年多,是他的斗士时期。学者的时期最长,斗士的时期最短,然而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;而在诗人和学者的时期,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。”(朱自清《开明版〈闻一多全集〉序》)在三个角色中,学者时期不仅持续时间最长,也正是这一学者身份,给闻一多生前带来了最大的名誉。

闻一多是一个非常看重名誉的人,他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题目就是《名誉谈》。在这篇文章中,他认为一个人对名誉的追求,能够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:“吾辈今日所享之文明,其何以致之,皆古人好名之一念所留耳。”他甚至将名誉视为一个人的第二生命:“古来豪杰之士,恒牺牲其及身现存之幸福,数濒于危而不悔者,职此故耳。然则名之一字,固斯人第二之生命。”闻一多早年确立的这种名誉观,贯穿了他的一生。

1937年，抗战刚刚开始。清华大学南迁至长沙，与北京大学、南开大学组建长沙临时大学。1938年初，随着战事的吃紧，由三校组建的临时大学又准备西迁至昆明。迁校前，回湖北探亲的闻一多在武汉遇到了时任教育部次长的老友顾毓秀。顾毓秀力邀闻一多参加正在组建的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。闻一多几乎没有多加考虑，就一口拒绝了。尽管妻子主张闻一多接任此职，并因闻一多的坚持己见，致使夫妻之间一度产生龃龉，闻一多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。

由于时间的紧迫，闻一多没有等到与妻子达成共识，便匆匆返校了。在随后写给妻子的信中云：“此次不就教育部事，恐又与你的意见不合，我们男人的事业心重，往往如此，你得原谅。”由于妻子负气，近一月没有回信。闻一多在随后所写的家信中流露出了不愉快的情绪：“一个男人在外边奔走，千辛万苦，不外是名与利。名也许是我个人的事，但名是我已经有了的，并且在家里反正有书可读，所以在家里并不妨碍我得名。这回出来唯一目的，当然为的是利。讲到利，却不是我个人的事，而是为你我，和你我的儿女。何况所谓利，也并不是什么分外的利，只是求将来得一温饱，和儿女的教育费而已”，“你或者怪了我没有就汉口的事，但是我一生不愿做官，也实在不是做官的人，你不应勉强一个人做他不能做不愿做的事”。

这几通夫妻间的私人信件，最能够反映闻一多当时对待为学与问政的真实心态。闻一多是一个非常坦诚的人，他并不讳言，男人在外奔波，是为了名和利，这符合他一贯的名誉观。在信中，闻一多还将自己定位成一个不能做官，也不愿做官的读书人。有了这样一种定位，闻一多认为适合自己博取名誉的途径，不是通过做官，

而是通过读书与做学问。闻一多的这一心思对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妻子说得还不算太清晰，在他随后写给顾毓秀的信中表白得更清楚了：“承嘱之事，盛意可感。惟是弟之所知，仅国学中某一部分，兹事体大，万难胜任。且累年所蓄著述之志，恨不得早日实现。近甫得机会，恐稍纵即逝，将使半生勤劳，一无所成，亦可惜也。”至此可知，闻一多给妻子所说的“男人的事业”，正是他藏之名山的著述计划。

成为一个学者，闻一多在早年就产生过这一愿望。1922年10月，闻一多刚到美国，在写给闻家驥、闻家驊的信中谈到了自己的求学兴趣：“我现在对于文学的兴趣还是深于美术。我巴不得立刻回到中国来进行我的中国文学底研究。我学美术是为帮助文学起见的。”1923年4月，闻一多在写给闻家驊的信中说：“近方作《昌黎诗论》，唐代六大诗人之研究之一也。义山研究迄未脱稿，已牵延两年之久矣。今决于暑假中成之”，“工部诗云：‘千秋万岁名，寂寞身后事。’我诚知攫取名誉非难事也，然今亦看穿矣。尤孜孜于著述者，非求闻望，借以消磨岁月耳”。可见，早年留学美国的闻一多，尽管所学专业为美术，却始终没有放弃对文学研究的兴趣。回国以后，闻一多已经成为闻名全国的诗人了，《红烛》、《死水》已广为传诵。即便如此，闻一多仍在做着—一个学者梦。1926年冬，他写信给饶孟侃：“别后诗思淤塞，倍于昔时，数月来仅得诗一首，且不佳。惟于中国文学史，则颇有述作。意者将来遂由创作者变为研究者乎。”梦毕竟是梦，闻一多在二十年代，除了不时有新诗作面世外，有关文学史研究的著述，仍不见踪影。

三

惊醒闻一多学者梦的是与他相关的两次在高校被驱逐事件。闻一多在早年就一直希望能在高校谋得一个教授文学史的教职,不过起初的两次经历,真的不能算是成功。在武汉大学、青岛大学这两次被驱逐事件中,闻一多都是派系斗争的牺牲品,无论如何,一旦不自觉陷于斗争的漩涡之中,闻一多所受的伤害还是很大的。如果说武汉大学的学潮对闻一多的影响并不算很大,他尚能够很快摆脱失落的心态,重新振作起来;而青岛大学以“驱闻”为矛头指向的学潮带给闻一多的伤害,则很难一时抚平。尤其让闻一多不能释怀的是学生对他人品、学品的攻击。在由青岛大学非常学生自治会印发的《驱闻宣言》中,对闻一多有这样的断语:“他以一个不学无术的学痞,很侥幸与很凑合的在中国学术界与教育界窃取了一隅地位”,“其他的如他的不通与不学无术的事实,因篇幅关系,不再详提”。关于这次学潮,梁实秋在《谈闻一多》中有回忆:“在整个风潮里,一多也是最受攻击的对象之一。有一个学生日后回忆说:‘记得当时偶尔走经青岛大学旁的山石边时,便看到一条刺目的标语: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。’‘不学无术’四个字可以加在一多身上,真是不可思议”。“我和闻一多从冷静的教室前面走过,无意中看见黑板上有新诗一首:‘闻一多,闻一多,你一个月拿四百多,一堂课五十分钟,禁得住你呵几呵?’这是讥一多平素上课说话时之喜欢夹杂‘呵呵……’的声音。一多看了也只好苦笑。”闻一多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,在武汉大学被驱逐时,他贴了一张布告进

行反击，说对于自己的职位（文学院院长），如“鸸雏之视腐鼠”，以此来宣泄自己心中的不满。这次的反应反而非常冷静，学潮风波还没有完全平静，他写信给饶孟侃，信中写道：“我以数年来的经验，劝告你，除努力学问外，第一件大事是努力挣钱。”挣钱也即节省开支，是出于生计的考虑，相比之下，努力学问尤为重要。可见，学生将“不学无术”的帽子扣在闻一多的头上，深深地刺伤了闻一多的自尊心。

闻一多在离开青岛大学之前，已经确立了自己在新诗创作、评论中的地位，尤其在新诗创作的理论上，进行了卓有成效、独具特色的探讨，以今天的观点来看，这不能不算是学问。学生将“不学无术”的帽子扣在闻一多头上，固然有人身攻击的不理性的成分，但是，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在二三十年代，新诗创作，包括新诗理论的探讨，都不被视为真正的学问。这一点，我们也可以通过沈从文的经历来说明。沈从文的经历和闻一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两人都从事新文学的创作、评论、创作理论的探讨，两人都在武汉大学、青岛大学、西南联大共事过。用沈从文的经历、体会来分析闻一多的遭际，应该是很恰当的。

1930年11月，在闻一多刚离开武汉大学还不到半年，当时还在武汉大学的沈从文写信给王际真谈到自己在武大的心境：“我若得了机会，就到外国来扮小丑也好。因为我在中国，书又读不好，别人要我教书，也只是我的熟人的面子，同学生的要求。学生即或欢迎我，学校大人物是把新的什么都看不起。我到什么地方总有受恩的样子，所以很容易生气、多疑，见任何人我都想骂他。我自

己也只想打自己，痛毆自己。”沈从文在同年九月还曾写信给胡适，谈到自己的治学打算：“图书馆中书不少，不过我到图书馆看的是关于金文一类书籍，因为在这方面我认得许多古文，想在将来做一本草字如何从篆籀变化的书。可惜的是我对于治古文字形象学问必不可少的上古中古史，知道不多，且具常识而缺少正确知识，对于古地理学也处处感到无所措手。我想得先生指示一下，关于古地理、古史，近人同往人有些什么书可看。王国维的是看过的。”从沈从文的信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新文学在当时被人轻视，以新文学创作著称于世的小说家、诗人即便进入高校，做了作家教授，也同样不被人看重。在此情势之下，备受精神煎熬的沈从文甚至要改行从事古文字的研究。因为，在时人看来，研究古代的学问才叫真学问。

直到1932年8月，闻一多来到自己的母校——清华大学，应聘为中国文学系教授，学校本来想请他兼任文学系主任，闻一多坚辞不就，给臧克家写信说：“以后决不再做这一类的事了。”这显然吸取了武汉大学、青岛大学的教训。这也是他“我一生不愿做官，也实在不是做官的人”这样一种自我定位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因。

来到清华的起初一段时间里，闻一多似乎还没有完全从过去的阴影里走出来。他在1933年9月29日写给饶孟侃的信中说：“近来最怕写信，尤其怕给老朋友写信。一个人在痛苦中最好让他独自闷着。一看见亲人，他就不免就伤痛起来流着泪。我之不愿给你写信，一面是怕勾引起数年来痛苦的记忆，一面又觉得不应将可厌的感伤的话在朋友面前唠叨，致引起朋友的不快。”来到清华，闻一多确乎将自己与外界完全隔离了，这一方面像他在信中所说的，他在舔

舐、疗治自己的伤口；另一方面，左冲右突的他正努力发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，这是一个自我蜕变的过程，尽管痛苦，却也夹杂着些许兴奋：“我近来最痛苦的是发现了自己的缺陷，一种最根本的憾事——不能适应环境。因为这样，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，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。在这向内走的路上，我却得着一个大安慰，因为我证实了自己在向内的路上，很有发展的希望。因为不能向外走而逼得我把向内的路走通了，这也可说是塞翁失马，是福而非祸。”闻一多所说的“向外走”指从事行政工作，前此的经历已证明此路不通；“向内走”指的是从事学术研究，在同一封信中，闻一多向饶孟侃详细介绍了自己的研究计划：一、《毛诗字典》，二、《楚辞校议》，三、《全唐诗校勘记》，四、《全唐诗补编》，五、《全唐诗人小传订补》，六、《全唐诗人生卒年考》，七、《杜诗新注》，八、《杜甫传》。这些计划，并非心血来潮，一拍脑瓜想出来的，其中很多项都已接近完成，或是已经做了非常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。可以看出，闻一多的研究计划完全远离了自己赖以成名的新诗创作、新诗评论，完成了向古典学者的蜕变。

闻一多在完成向古典学者蜕变的同时，也在影响他周围的朋友。饶孟侃也是新月派的重要成员，此时正准备转向金石学的研究。闻一多得知饶孟侃的这一变化，写信给他：“你现在注意金石，这诚然是一件正经事。但我劝你注重研究，勿单鉴赏而已。”在闻一多看来，与新诗创作相比，金石之学才是一件正经事。饶孟侃似乎并没有成功转型。相比之下，同样在闻一多影响下写作新诗的陈梦家，却成功转型，成为一个重要甲骨文研究学者了。闻一多在向

臧克家谈及陈梦家的这一变化时，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：“我觉得一个能写得出色诗来的人，可以考古，也可以做别的，因为心被磨得又尖锐又精练了。”此时的闻一多需要确立一种坚定的学术自信。

四

当时的清华大学虽然已非研究院四大导师俱在的鼎盛时期可比，但也群贤毕集。加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，也集一时之选。要在北京这样一个大的学术环境中有所成就，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。此时的闻一多在大多数人心目当中，也还是一个新体诗人。当他向学生讲授古典文学时，很多学生对他的权威性表示怀疑。曾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吴组缃回忆说：“闻先生的文人气质很浓，他是新诗人，却讲古代文学，所以总觉得同学不满意。那时，清华同学与老师年龄相差不太多，有的已在刊物上发表过文章，因此认为自己不比老师差。再说当时文学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古代文学”，“同学们中间确实有人存有闻先生是新月派，教不了古代文学的想法。一次课上先生讲训诂，认为‘振’、‘娠’互通，赖天纒同学认为先生讲的没有根据，先生很生气，发了脾气，说：‘你说该怎么讲？’我在一边笑了，先生说：‘你笑什么？’我说：‘你说不同的意见可以讲，人家讲了你又发脾气。’课上不下去，闻先生也一周没来上课。后来先生到教室，见没有人，又去宿舍让我们上课去。”更有甚者，曾有一个学期，闻一多开设楚辞课，只有孙作云、王文婉两人选修。偌大的一个教室，师生相对仅三人。闻一多仍然讲得十分认真。孙作云回忆道：“闻先生在这一年是颇有点负气的，所以他在这一年

里拼命地预备功课，全心全意地为我们讲解。”可以想象，这种来自学生的强大的外部压力，对于性格倔强的闻一多来讲，压力会变成一股巨大的学术推动力。他要用自己的努力来捍卫自己的学术尊严，来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。

除了来自学生的压力以外，还有来自同行的压力。闻一多来到清华所开设的课程为“文学专家研究”（主要是唐代诗人）、“先秦汉魏六朝诗”。陈寅恪是清华研究院创办时最早的四位导师之一，在学界早就享有很高的名望。从1931年到抗战爆发，这段时间是陈寅恪对唐代历史和唐代诗文用力最勤、成果也最为突出的时期，闻一多任教清华时，陈寅恪正在中文系开设“白居易研究”。与这样一位成就卓著的学者一同讲唐代文学，闻一多所面临的压力无疑是非常大的。

现在没有直接的材料证明闻一多与陈寅恪有过学术上的交流，不过，通过一些间接的材料，我们还是能够看出陈寅恪在治学上对闻一多产生的影响。我们如果比较一下闻一多来清华前后的研究可以发现，前此的研究像《庄子》、《杜甫》、《杜少陵年谱会笺》、《唐代文学年表》等，从方法上讲还处于摸索的阶段。来到清华后，闻一多几乎完全否定了以前的研究工作。他1933年9月29日写给饶孟侃的信中，检讨了自己以前的研究工作：“寒假很想到河南旅游，尤其想看洛阳——杜甫三十岁前后所住的地方。不亲眼看看那些地方，我不知《杜甫传》如何写。从前在《新月》发表的那一段，完全要不得。”1927年8月10日，《新月》第一卷第六期发表有闻一多的《杜甫》，现在看来，是诗人闻一多兴之所致的产物。六年

后，闻一多再提到这篇文章，便“悔其少作”了。任教清华后，闻一多研究工作的一个很大的变化，就是研究的视野更为开阔了，开始把研究对象放在整个文学史的进程中去思考，并能充分关注与研究对象相关联的各种历史因素。

1933年6月15日，朱自清在自己的日记中记录了与闻一多谈论唐诗的情况：“一多下午来谈其对于初唐文学的见解：（1）时辑类书（如《艺文》、《北堂》等）之风甚盛（一多疑欧阳询及虞世南辑此两种书，乃建成、元吉与太宗两派之竞争），而注家亦盛，如李善、章怀太子、颜师古等，故学术实盛于文学，而注家影响，实较类书为大。（2）《初学记》有事对，较初期类书更进步，对后人颇有所助。（3）声律仍沿南朝之旧，似无新贡献。（4）宫体仍盛。（5）太宗之提倡文学，影响未必即佳，或受虞世南影响（虞长四十岁，太宗书法亦从之——欧阳询则习碑与虞不同）。如无太宗，陈、张华或早出，又陈蜀人，张岭南人，皆文化不多及处，乃能脱藩篱也。所论均极有见。”通过这段记录，我们看到了闻一多思考问题的变化，而这一变化也得到了朱自清的嘉许。随后写成的为后人所称道的论文《类书与诗》、《宫体诗的自赎》，在论述策略上，已大不同于以前。

闻一多治学方法的这一变化，和陈寅恪一再倡导的“了解之同情”的清华人文学术学风是一致的。陈寅恪在《冯友兰〈中国哲学史〉上册审查报告》：“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，其对于古人之学说，应具了解之同情，方可下笔。盖古人著书立说，皆有所为而发。故其所处之环境，所受之背景，非完全明了，则其学说不能评论，

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，其时代之真相，极难推知。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，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，欲藉此残余断片，以窥测其全部结构，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，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，始可以真了解。所谓真了解者，必神游冥想，与立说之古人，处于同一境界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，表一种之同情，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，而无隔阂肤廓之论。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，与今日之情势迥殊，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？但此种同情之态度，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。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，或散佚而仅存，或晦涩而难解，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，绝无哲学史之可言。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，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，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，所居处之环境，所薰染之学说，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。由此之故，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，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。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，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。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，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。此弊至今日之谈墨学而极矣。今日之墨学者，任何古书古字，绝无依据，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，而为之改移，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，喝雉成雉之比。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，诚可为长叹息者也。”陈寅恪曾多次谈到自己不敢观先秦之书，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担心由于材料的匮乏，在评说中极易流于附会。而这一点也正是时人治先秦子史之学者所常见的弊病。为矫时弊，陈寅恪提出了“了解之同情”的原则。即借助现存之零星材料，摹想古人立论之苦心孤诣。而不能以今人之识见遽下论断。能做到这一点，就必须在处理史料

时持审慎的实证态度，要像一个善于勤俭持家的人一样，小心呵护自己的家底，把家中哪怕是一粒米、一滴油都用得恰到好处；而不能像一个败家子一样，把祖宗留下的万贯的家产丢弃得一干二净。第一种态度是一种释古的治学态度，尽管面对的是伪史料，处理起来也应别具通识，“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，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。然真伪者，不过相对问题，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，而利用之。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。如某种伪材料，若误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，固不可也。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，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，则变为一真材料矣”。（《冯友兰〈中国哲学史〉上册审查报告》）而第二种则是疑古派的态度，以今人的眼光、标准来别择史料，则罕有入其法眼者，这种对待史料的简单、粗暴的态度，正是陈寅恪所竭力反对的。

三四十年代，陈寅恪除了为冯友兰的著作写过审查报告外，还为杨树达、刘文典等其他清华同仁的著作写过序，其中所阐明的观点大致是一贯的。陈寅恪的这些文字，不单纯是以奖掖为目的，他试图在标举一种学风，建立一个独立的学派，后人也称之为“清华学派”。“释古”的态度正是这个学派所秉持的治学原则。尽管闻一多不曾为自己的著作索序于陈寅恪，纵观闻一多来到清华在学风上的自觉变化，非常符合“释古”的治学原则。

至抗战爆发前，闻一多利用在清华五年的时光，奠定了自己作为学者、文学史家的地位。此时尽管还没有学术专著问世，但他陆续发表的有关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的论文，已赢得了学界同行的好评。曾任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这样评价当时的闻一多：“一多到清